

甚麼是白話文運動

對《中國大百科全書》 「白話文運動」詞條的症候式閱讀

| 白話文運動的背景 ■ 《中國大百科全書·
語言文字卷》 ■ 唐宋說 ■ 裘廷梁
〈論白話為維新之本〉 ■ 表音文字
■ 表意文字 |

| 白話文運動的經過 ■ 胡適 〈文學改良
芻議〉 ■ 〈文學革命論〉 三大主義
■ 〈狂人日記〉 ■ 《新潮》 ■ 八不主義
■ 《學衡》 |

| 白話文運動的成就 ■ 《中國新文學大系》
■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 新格律詩派
■ 毛澤東 〈反對黨八股〉 |

| 白話文運動的影響 ■ 國家語言文字工作
委員會 ■ 文字改革 ■ 朱光潛 ■ 《中華
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 |

察《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有關「白話文運動」(Vernacular Movement)的詞條，陳述如下：

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從北京推向全國的一場劃時代的文體改革運動。它提倡書面語不用文言，改用白話或語體。白話文運動先在「文學革命」的口號下發動，進而在「思想革命」中發展，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環節。運動的提倡者主要是胡適、陳獨秀、錢玄同、魯迅等。他們以《新青年》為主要陣地，以北京大學進步師生為主力，同形形色色的文言維護者開展論戰，贏得了白話文的勝利。¹

這一詞條由胡奇光撰寫。簡短定義後，分別就「白話文運動的歷史背景」、「白話文運動的經過」、「白話文運動的成就」、「白話文運動的影響」四個方面作出論述。該書出版於1988年，代表了當時學界的共識。

本章節以該詞條的論述標目為線索，展開較為詳細的評注式討論。（以下每節起始楷體部分為該詞條原文，引自《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不再出注。）

如果承認胡適是首倡者，那麼這場波瀾的初潮之湧實際上發生在美國。與幾位留學生之間關於文字和文學的爭論，由於胡適將它們寫成通信和文章發表於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而廣為人知。胡適〈逼上梁山〉一文言之甚詳，不必贅述。「五四前後」的說法特別耐人尋味，它實際上在暗示白話文運動與五四運動之間的聯繫，但以史實探究，這一少數人提倡的文體革新與1919年5月4日那一日發生的群眾遊行毫不相關。如果一定要把它與某個「大寫日期」聯繫起來共同注釋歷史，應當是1911年

1. 《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頁13。本章每節起始楷體部分均為此詞條原文，引自《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不再出注。

的辛亥革命。民國的成立，使少數得風氣之先的人覺得應該以一種新的書面語言來寫作了。20世紀，一系列大事相繼發生，起先取消了科舉考試，使八股文沒了出路，接下來宣統皇帝退位，中華民國甫一成立，立刻頒佈大總統令，強迫剪辮，禁止纏足，一時間移風易俗氣象一新，雖然在政治上實質實現民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畢竟體制變了，一整套術語也不得不跟着變，推翻帝制給國人帶來的鼓舞是時下的人無法想像的，這個意義上講，五四運動也是辛亥革命的一個效應。帝制下的表達方式乃是「公車上書」，只有先取得國民資格，才可以上街遊行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清末的白話文運動，包括多種注音字母方案，皆是上奏朝廷，希冀得到聖上的認同，一紙詔書下來，風行天下。民國之後，這個途徑斷絕了，於是主張便以報刊雜誌直接面向公眾，陳獨秀同意胡適並與之呼應，本是兩人相契，與君何涉，但由《新青年》公之於眾，而成了驚天動地的大事。公共言論空間的建立，給問題與主義的爭論以可能，有沒有這樣的言論空間，乃是帝制和民國的根本差異。

「劃時代」云云，乃是對於所謂「時代」的一種定義，定義乃是如此去定義的權力。「五四」已經被最高權力定義為「劃時代」了，前後略一延伸，何等輕巧。以白話做書面語，並不自今日始，白話小說即使從明代起算，也有500年以上的歷史。當初胡適與梅光迪、胡先驌等人的分歧主要在白話能不能寫詩這個問題上，所以才有《嘗試集》的寫作和出版，白話詩是寫出來了，成為了名著，但是否就意味着成功了？詩人胡適，並不為人認可。胡適之後，還有更多的嘗試者，白話能寫詩嗎，肯定者有之，否定者也不少，1965年毛澤東給陳毅信中明確說，「用白話寫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²當然，這是他個人的意見，但不是他一個

2.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422。

人的意見。白話寫詩，假若還不好說成功，白話寫小說嗎，500年前已獲成功，然而那是先人的成就，論者匆忙宣佈的「白話文的勝利」到底指的是甚麼呢？後來幾乎所有論者，亦皆認為白話文運動成功了，這成功又指的是甚麼呢？

白話文運動的背景

文言文原是古人口語的摘要，早在先秦時代就已經出現。到西漢，封建統治者獨尊儒家學派，記載這些經典的文言文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萬古楷模。越到後世，文言文同實際口語的距離越遠。這種情況是不能適應社會和語言的發展的。從唐宋以來，白話文書面語逐漸興了起來。先是採用比較接近口語的「變文」、「語錄」一類文體，傳播佛教教義，後來隨着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和市民階級的抬頭而出現了用當時口語來書寫的明清章回小說。不過直到清代末年，白話文還只是局限在通俗文學的範圍之內，未能改變文言文獨尊的局面而作為通用的書面語。

歷代不少學者為了讓更多的人看懂書面文字，都主張書面語同口語相一致。1861年，洪仁玕（1822-1864）根據洪秀全的指示，頒佈〈戒浮文巧言諭〉，提出了改革文體的方針：「不須古典之言」，「總須切實明透，使人一目了然」。又過了二三十年，資產階級改良派為宣傳變法維新、開發民智而提倡白話文。如黃遵憲（1848-1905）引俗話入詩，宣稱「我手寫我口」（《雜感》）；裘廷梁（1857-1943）認為「白話為維新之本」，發出了「崇白話而廢文言」的口號；陳榮袞第一個明確主張報紙應該改用白話；王照更聲明自己制定的官話字母，只拼寫「北人俗話」，不拼寫文言。同時，他們還積極寫作通俗淺顯的文章。梁啟超（1873-1929）最先向霸佔文壇的桐城派古文挑戰，創制了「新文體」，用的雖

還是文言，但平易暢達，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已向着白話文邁出了第一步。接着白話書報在各地湧現，日見興盛，其中白話報紙有十多種，白話教科書有五十多種，白話小說有一千五百多種。可是直到辛亥革命（1911）之前，還沒有人自覺地去實現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這個重大的變革。從清代末年到民國初年，接連出現了幾件可以決定文體改革方向的大事：一是科舉制度的廢除（1905）；二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帝；三是粉碎了袁世凱的稱帝迷夢（1916），《新青年》發出提倡科學和民主、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思想的解放帶來文體的解放，覺醒了的廣大人民群眾，掀起了民主主義的浪潮，為白話文運動打下了群眾基礎。

文言與口語在先秦時代的真實狀況，至今無從確定。為何上文首句即斷定「文言文是古人口語的摘要」呢？是根據魯迅《門外文談》的觀點，然而，魯迅當初審慎、推測的語氣不見了，更由於1949年後魯迅先生不可懷疑的權威性，此說儼然成為定論。而白話文運動之初的綱領性理論，即採取西方語言學對文字的定義：文字是聲音的記錄，是語音的符號，而西方文字屬於「表音文字」，「語音中心主義」佔據語言的主導地位，文字是語音的附屬。但是，漢字是「表意文字」，不存在「表音文字」的類比性。呂叔湘早年曾說：「文字的起源大致和語言無關，」並且「一部分文言根本不是『語』，自古以來沒有和它相應的口語。」³但長期以來，這一認識未能得到傳播和重視，於是以西方文字定義硬套漢語和漢字，乃相沿成習，鑄成共識。語言學研究著作《馬氏文通》以印歐語性質為標準看待漢語，「把印歐語所有而漢語所無的東西強加給漢語」（朱德熙語）。由此可見，始於「言文一致」的傾向，在百年漢語研究中未得到質疑，而視之當然，直至近

3. 呂叔湘，〈文言和白話〉，《國文雜誌》，1944年，第三卷第1號。

年，有人從理論上提出漢語的「字本位」，⁴認為文言為口語摘要的判斷，出於西方的語言觀。

詞條緊接寫：「到西漢，封建統治者獨尊儒家學派，記載這些經典的文言文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萬古楷模。」語言為全國人民所共有，無階級性，此乃語言學界的共識。若說西方「語音中心主義」是白話文運動主動上當的第一次，那麼，第二次便是語言學的所謂「階級論」。五四時期，文言被指為封建統治階級的語言，白話是人民的語言，由此二分，意識形態話語於焉形成，「文言」從此被判決為腐朽的、落後的、統治階級和沒落文人所使用的死語言。否定文言文，與否定由文言文所書寫、記載的儒家經典（當不限於儒家），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綱領。錢玄同在《新青年》上說：「中國文字，論其字形，則非拼音而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於識，不便於寫；論其字義，則意義含糊，文法極不精密；論其在今日學問上之應用，則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詞，一無所有；論其過去歷史，則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為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記號。此種文字，斷斷不能適用於20世紀之新時代。」又道，「我再大膽宣言道：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20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⁵今日讀這些話，偏激之甚，錯謬之深，已無須辨析了。

越到後世，文言文同實際口語的距離越遠。這種情況是不能適應社會和語言的發展的。

4. 徐通鏘，《漢語結構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語言研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05年；潘文國，《字本位與漢語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

5. 錢玄同，〈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蔡尚思主編，《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416。

書面和口語的不一致⁶，自古已然，明清尤甚，其原因在於文言文寫作以復古為時尚，唐宋八大家便是明清作文的楷模。⁷但白話文的滋生與蓬勃，亦正在此一時期。之所以文言與口語的不一致成為問題，是與西方語言接觸後，兩相比較的結果。語言學的進化論，一度被國人奉為真理，而作為印歐語言之特色的「言文一致」，成為改造漢語的最終訴求，這一努力至今未見成效。現代白話文，依然言文不一致。朱德熙認為，五四之後的白話文學作品也不是真正的口語，而是「拿北方官話做底子，又受到明清白話小說相當大的影響，還帶着不同程度的方言成分以及不少新興詞彙和歐化句法的混合的文體」。⁸言文不一致的根本原因在於，漢字是形意文字，而非寫音文字，除非採用拼音取代漢字，否則永遠不可能一致。走拼音化道路，在數十年時間曾經是國家文字改革的方向。越南、朝鮮、韓國、日本，都有不同程度的「去漢字化」運動。

從唐宋以來，白話文書面語逐漸興了起來。先是採用比較接近口語的「變文」、「語錄」一類文體，傳播佛教教義，後來隨着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和市民階級的抬頭而出現了用當時口語來書寫的明清章回小說。

以上「唐宋說」，採納的是胡適在《白話文學史》中的觀點，王力亦有相近看法。《古代漢語·緒論》認為，古漢語有兩個書面語系統，「一個是以先秦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上古漢語書面語

6. 臺靜農認為，「中國語言與文字分離，並不是單純的時間因素，而文字本身實是最大的因素。」臺靜農，《龍坡論學集》，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

7. 朱德熙認為，「書面語和口語的差別一直相當大。在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以前，書面語和口語的區別實際上是古今語的區別。以唐宋時代為例，當時人口裏說的是白話，筆下寫的是文言，即是以先秦諸子和《左傳》、《史記》等廣泛傳誦的名篇為範本的古文文體。這種情形往上大概可以推到兩漢時期。往下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初葉。」《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版，頁132。

8. 《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頁13。

言，以及後來歷代作家仿古作品中的語言，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文言；一個是唐宋以來以北方話為基礎形成的古白話。」⁹ 徐時儀的《漢語白話發展史》，是系統探討漢語白話發展史的著作，在文白長期並存的古代漢語書面語系統中，將白話的歷史分為露頭期（先秦和魏晉南北朝）、發展期（隋唐五代宋元）和成熟期（明清）。事實上，漢語第一次與印歐語言的接觸從東漢佛教入傳便已開始，梵文不但影響了漢語對音韻的重視，且佛經的漢譯所形成的「內典」，也成為首個與文言文形成差別的獨特文體。王國維認為《楚辭》、《內典》、《元劇》中的文章，在美學風格上可鼎足而立。《朱子語類》乃朱熹門人記錄其講學語錄的彙編，為使聽者易於領會，語不求深，多方設喻，如話家常，以明白顯豁為追求。記錄者雖難免加工，仍保存了大量時語。以口語宣講理學，由此成為一種傳統，王陽明《傳習錄》即為一例。朱熹陽明以達意為目的，文言便任其文言，白話亦任其白話，沒有非此即彼，或以彼此的高低相較。至於明清是否出現過所謂「資本主義萌芽」頗費爭議，中國歷史自具軌跡，套用西方歷史模式，有蓄意誤導之嫌，況語言的發展演變，與資本主義何涉？「市民階級」一語也嫌牽強，城市人口或可統計，是否稱得上階級，尚存疑問。明清章回小說的古代白話與文言一樣，屬書面語系統，認為明清章回小說使用的是一種不同於文言的「白話書面語」則可，若說他們「用當時口語來書寫」則未必。今天的白話文也不是以今天的口語書寫，有誰會像新聞聯播那樣說話的嗎？但寫起文章來，卻不自覺與某種腔調保持驚人的一致。書面語和口語的界限不容混淆，白話書面語，也並不等於口語，其差別在於一是用來閱讀，一是用以傾聽，「目治」與「耳治」有別，豈可不論。由於廣播電視網絡視頻等技術手段的出現，我們還須區分「原生

9. 王力，《古代漢語》緒論，中華書局，1982年。

口語」和「次生口語」的不同，媒體上的「領導講話」、「辯論會場」、「談話節目」、「主持人語」以口說的形式傳達，但並非真正的口語，有時被譏為「不說人話」其實自有不得已之處。

不過直到清代末年，白話文還只是局限在通俗文學的範圍之內，未能改變文言文獨尊的局面而作為通用的書面語。

其實，白話文並不局限於通俗文學。上述佛家的「變文」「俗講」、儒家的「語錄」雖則通俗，但不在文學之列。文言亦非一成不變，之所以長期居於「獨尊」地位，乃因文言能夠順應歷代語言的變化而變化。有人指出，韓愈的文章明顯不合先秦語法，明證唐朝的口語到底還是入侵了文言。錢基博評梁啟超政論體有言：「酣放自恣，務為縱橫軼蕩，時時雜以俚語、韻語、排比語及外國語法，皆所不禁，更無論桐城家所禁約之語錄語、魏晉六朝藻麗俳語、詩歌中雋語、及南北史佻巧語焉。」¹⁰ 梁體不僅為當時報章雜誌爭相刊發，今時台港海外中文報刊依然沿用其緒，並無難懂之弊。由此可見推斷文言與白話自古以來的對立，是虛構的、誇張的，更未有文言與白話之間不可兼容的緊張仇怨。文與白、書與言，曾經長期共存、並行、輔助、長育，雖偶或相犯，但井水河水，兩相活泛。是故白話文運動從顛覆到成功，一躍而居至尊地位，進而廢除文言，也許可視作某一底層叛逆故事在語言變革中的假想劇情。

把明代的四大奇書視作通俗文學，本身即為新文學運動的偏見，漢學家浦安迪稱之為「文人小說」乃卓異之見，更準確的看法是民間流傳過程中多次加工的文人小說，在此問題上若還存在爭議的話，那麼《紅樓夢》、《儒林外史》、《鏡花緣》等偉大白話經典作品廣為人知之後，硬說白話文「局限在通俗文學的範圍

10.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343。

之內」就太不顧事實了。曹雪芹和吳敬梓無疑是那個時代最優秀的作家，他們以嫻熟的白話書面語寫作之時，從來不知甚麼叫文言獨尊，略早於他們的蒲松齡以文言撰寫《聊齋志異》，亦絕不會看不起白話。科舉考試不以文言、不寫八股不行，而創作特別是著小說，以白話還是文言悉聽君便。四大奇書問世經已百年，白話章回體小說的偉大傳統，在16世紀奠定，寂寞了一個世紀再次煥發異彩，經過李卓吾、毛宗崗、金聖歎、張竹坡等人評點鼓吹，《三國演義》、《水滸傳》這樣的白話文體，已與莊騷史記並列成為經典。

歷代不少學者為了讓更多的人看懂書面文字，都主張書面語同口語相一致。

所謂「歷代」學者，哪代誰何？最早作此主張者黃遵憲，在《日本國志》中說，「余聞羅馬古時，僅用臘丁語，各國以語言殊異，病其難用。自法國易以法音，英國易以英音，而英法諸國文學始盛。耶穌教之盛，亦在瘳《舊約》、《新約》就各國文辭普譯其書，故行之彌廣。蓋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其勢然也。」¹¹ 此書據推斷最晚於1895年公開刊行，此前已廣為人知，作者做過10年外交使節，又以「詩界革命」之倡見重於仕林，此論一出，影響之巨，不難推想。以歐洲近代民族語言從中世紀統一的拉丁語中分離而出的例子，對照漢語的自我更新，對後來的「白話文運動」思路，發生決定性的影響。胡適後來即有此類比。裘廷梁著文〈論白話為維新之本〉把書面語和口語的分離，當作大問題，可謂是對黃氏論述的回應。所謂「一人之身，而手口異國，實為二千年來文字一大厄」。¹² 然而，

11. 《黃遵憲全集》下卷，中華書局，2005年，頁1420。

12. 裘廷梁，〈論白話為維新之本〉，張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7年，頁38。